

近代國際關係史

Modern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14-1914)



POLIS

1997

近代國際關係史（1814～1914）

張麟徵◎著

近代國際關係史（1814-1914）

著 者 張麟徵

出 版 者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葉忠賢

總 編 輯 林新倫

副總編輯 賴筱彌

登 記 證 局版北市業字第 1117 號

地 址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88 號 5 樓之 6

電 話 (02)23660309

傳 真 (02)23660310

郵撥帳號 19735365

戶 名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蕭雄淋律師

印 刷 鼎易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二刷 2003 年 11 月

I S B N 957-818-447-6

定 價 新台幣 500 元

網 址 <http://www.ycrc.com.tw>

E-mail book3@ycrc.com.tw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近代國際關係史（1814-1914）／張麟徵著．--

初版．-- 臺北市：揚智文化，2002[民 91]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818-447-6（平裝）

1.世界史—19 世紀 2.國際關係

578.09

91017303

序

研讀歷史常常令人會心微笑，或悵然感嘆。這些年來看到美國總統中有人極力宣揚民主政治，大力推展人權外交等普世價值時，我們好像看見了百多年前英國政治家的影子，如標榜英國政治理念在維持所有國家自由獨立，並將其文明推廣到全世界的帕瑪斯頓，或高舉人道主義大旗，譴責英國政府支持土耳其暴虐統治，殺害異族的格蘭斯頓。可是事實又如何呢？強調支持所有國家追求自由獨立的帕碼斯頓，對於當時波蘭的自由獨立運動，結果是袖手旁觀；聲言追求人道主義，道貌岸然的格蘭斯頓，在殖民地的拓殖上也毫不後人，手段也未必都符合人道。

不僅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政治家會有這麼相似的言行不一，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政治家、論斷同一性質的事務，也有不同的標準。當我們看到小布希維護以色列人的權益，義正辭嚴時，他似乎完全忘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權益。當他譴責中國大陸人權保障不足時，他似乎忘了，土耳其對其境內的庫德人，人權保障似乎也好不到哪裡。

強權間的利益衝突和對抗也是老套，當我們看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後美蘇在伊朗和阿富汗鬥法時，那和十九世紀英俄在此一地區的衝突又有何異？不過是換了個主角而已。在這個勢力交會的新月地帶，這樣的戲碼還會一再上演可以肯定。

不同文化、宗教、民族、發展程度國家間上演的衝突，也是一樣的老戲碼，從十字軍東征到現在，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換著樣的出現罷了。不同的是，以前的強者對非我族類者是明白的鄙視，必欲據之為己有，或滅之而後快，無須掩飾。現在則是表面強調平等尊重，和平相處，骨子裡強者對弱者還是一樣的頤氣指使，一樣的想將之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接受其認可的價值觀。

國際關係史的演變發展，給我們最大的啓示是：要制約強權的擴充野心不容易，維持國際秩序不容易，要將國際秩序建立在正義的基礎上就更不容易。國家像個人，有了權力，就有濫權的傾向，一定要有制衡的力量加以約束。國內政治要靠制度、靠權力分立來達到制衡，即便如此，還是有力有未逮的時候，要用革命、政變來重新洗牌，將失衡的政治納入軌道。國際政治，在一次大戰以前，大約都靠致力於尋求權力平衡，來維持穩定。一旦權力失衡，某一國家實力獨大，就有掀起大戰的可能。拿破崙戰爭如此，一次、二次大戰亦莫不如此。

學究氣質的美國總統威爾遜，素來厭惡歐洲國家間的權力平衡遊戲，理想主義的他，想在戰後創建一個維持國際和平與秩序的組織，把國際社會納入國際法規範之下，讓每個國家都能循規蹈矩，國際社會從此戰爭斂跡。雖然立意甚佳，但不合國際社會的本質，連他本國人民都不支持，結果二十年後又爆發二次世界大戰。二次戰後的聯合國想完成國際聯盟的未竟之功，不錯，二戰結束已經半個多世紀，三次大戰並未爆發，但區域性的戰爭還少嗎？三次大戰未發生，是聯合國維持秩序與和平之功嗎？真正的答案可能是核子戰爭的代價沒有國家付得起，這才是恐怖平衡得以維持的原因。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關係會往哪裡走？美國今天一超獨霸的地位可以永續保持嗎？地區性難解的衝突會一直延續下去嗎？毀滅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避免嗎？國際社會嚴重的貧富不均，環境生態的空前威脅，有解決的方法嗎？這些問題都不容易預測和答覆。不過在前瞻未來時，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過去。歷史當然不會原樣重複，因為時代在演進，科技一日千里，國際社會的異質性遠較以往突出。但人的本性、國家的本質，變化的可能性不大，同樣的或類似的錯誤還是可能出現。歷史是一面鏡子，即便不可能原貌重現，但發揮一下想像力，鑒往知來的功效還是有的。爲了儘量避免重蹈覆轍，歷史還是有參考價值。現在，讓我們回頭來看看十九世紀的國際關係，看能否從中得到一點教訓，一點啓示。

細加分析，從1814到1914年的百年裡，國際關係的演進是有脈絡可

循的。從趨勢來看，它不可能長期維持在十八世紀的政治思想、權力結構上。梅特涅建構的那個國際體系，從奧國的利益來看，絕對值得全力維護。但是這個建構在保守主義上的國際體系，本來就是先天不良，後天失調，難以獲得長期支撐也就不足為奇。先天不良，是因為在拿破崙戰爭期間，保守主義已經受到來自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侵蝕。這些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的病毒，在戰後只是暫時被壓下，並沒有徹底消滅，也無法徹底消滅。只要免疫力稍差，它就會捲土重來。後天失調，是因為戰後的奧國本身問題重重，但卻自以為身體健康，未採取適當治療措施好好調養。再加上東歐三個保守國家間利益有所衝突，與西歐的英國又有意識型態的矛盾，法國更是要防範東山再起搗蛋的對象，歐洲國際社會的共識不足，內聚力欠缺，要維持梅特涅建構的這個維也納體系談何容易？

在這個情況下，革命可以預期。雖然經由干預鎮壓，1820年、1830年、及1848年的革命都失敗了，但每經一次革命，革命就聚集了更多政治能量，就預言了其成功之日不遠。如果要避免革命，就必須進行改革，梅特涅也不是沒有嘗試改革，但是老大的哈布斯堡王室、貴族地主形成的巨大阻力、多元民族國家的先天困難，顯然不容易克服。

任何一場戰爭結束，勝利的一方都想盡辦法把現狀架構在最有利於己的基礎上，雖然維也納建構的體系對戰敗的法國夠寬大，也是由於此一原因，才使維也納體系可以維持那麼多年。但即便如此，還是有國家想在調整或推翻體系的變革中，爭取本身更多的利益。於此，自由與民族主義成了推波助瀾的大幫手。這樣的趨勢可以預見，如果保守的皇室沒有憂患意識，又專斷獨行，再有遠見的首相外相也無能為力。

從趨勢上看，五十年代末期以後，梅特涅體系的解構已經無可避免。隨著體系的逐漸瓦解，原來架構歐洲均勢的一些國際規範也漸漸走調，什麼正統主義、補償原則、條約神聖、多邊協商機制等，都面臨嚴重考驗，但這些規範不是一夕消失，而是一點點的被侵蝕。

經過義大利與德意志的整合、統一，七十年代以後，歐洲權力架構已經與1815年時截然不同，這個新的權力架構不是經過集體協商的機制

所建構，而只是經由少數國家參與，逐步調整所出現，國際社會對如何維持此一新的權力均勢，並無任何共識，也未意識到它有多大的危險性。也許當時它們還認為若干舊的規範，如條約神聖、多邊協商、乃至於補償原則都還可以適用，新的情勢還可以靠舊的規範來穩定，但事實並非如此。如果舊的條約，如維也納協議，可以經由強制的行為，如戰爭，一點點撕毀，而不會引起任何制裁，我們就很難期待新的條約會得到尊重與信守。如果所謂多邊協商，只是形式上對一個片面更改的國際事實作追認，如1871年的倫敦會議，追認俄國在1870年10月，片面廢除1856年黑海中立化條款，則多邊協商的價值就毫無意義。如果國際情勢變更帶來的權力結構巨大調整，如義大利及德意志統一所帶來的變化，而不能對受此調整影響甚大的國家，如法國，給予適當的補償，反而認為法國一再追索補償，是令人厭惡的討賞行為，那麼補償原則其實就不再存在了。

由是，我們不僅要問，七十年代以後的國際均勢要靠什麼來維持？如果所有舊的規範都已經不再有規範的效用，則這個新的權力架構就只有靠對權力本身的操作來尋求平衡，達到均勢。這就是為什麼此後締結平時同盟的秘密條約如此風行，軍備競賽如此白熱化，強權間的衝突不斷升高，外交活動如此爾虞我詐的原因。舊規範解構，新規範未建立，每個國家都只有自求多福。在尋求機動維持權力平衡的遊戲中，每個國家都害怕自己對權力估算發生錯誤，因此寧可高估對手，也不能高估自己。於是，原是尋求權力均勢的努力，到頭來無可奈何的，變質為尋求權力優勢的遊戲。

在這樣一個沒有規矩可循，沒有國家可以信賴，國際信心指數幾乎歸零的時代，維持和平除了要靠政治外交家的策略，更要靠智慧。很可惜，在這個時代裡這樣的人物並不多。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逐漸浮出檯面的政治家如路易拿破崙、加富爾、俾斯麥，都想從推翻維也納體制中渾水摸魚。加富爾與俾斯麥受愛國主義與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民族主義的驅使，非朝此政策推進，無法完成其政治志業。就這個角度看來，他們的作為非僅無可厚非，從他們各自的

國家利益看來，還居功厥偉。但是就路易拿破崙而論，克里米亞戰後法國已經擺脫其伯父戰敗的恥辱，法國國際地位大幅上升，可以從巴黎成爲戰後議和重鎮一事上印證。路易要持盈保泰必須謹慎處理國際事務。就像蒂耶所說，盡力維護維也納體制，讓法國周邊只存在一系列小國，才最符合法國利益。可是路易偏不此之圖，反一心想從推動義大利與德意志民族整合運動中，爲法國爭取尺土吋地的蠅頭小利，實在沒有政治眼光。路易自詡其國際觀過人，其實是目光如豆。蒂耶對他的諫阻、批評，他不僅不能虛心接納，反而反唇相譏。普奧薩多瓦一役，法國當時的軍政部長杭動（Random）將軍說：「在薩多瓦被打敗的，是法國」，確實是至理名言，也是法國的不幸。

政治家對國際局勢的研判正確與否，對國家利益影響至鉅。不正確的研判當然導致錯誤的政策，有害國家利益。路易拿破崙對義大利與德意志統一運動的支持，證明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爲法國留下長久的後患。無獨有偶的是亞歷山大二世。亞歷山大二世因爲氣憤奧國忘恩負義，不念1848年革命中俄國拔刀相助之恩，反而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對俄落井下石。他感激普魯士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中立，在波蘭事件上的聲援，所以在普奧與普法戰爭中都對普魯士採取善意中立的支持態度，結果普魯士統一德意志後對俄國又如何呢？德意志日後反而長期支持奧匈對抗俄國，難怪英國史學家泰勒（Taylor）要仿杭動的話說：「色當一役，被打敗的是俄國」。

前瞻的能力與穿透性的眼光，是一個成功政治家或外交家必不可少的條件。具備這種能力，才能看出趨勢，才能趨吉避凶。除此之外，還需要清明的頭腦、冷靜的功力、與堅毅不拔，甚至有點跋扈的個性。具備這樣條件的人確實不多，帕瑪斯頓與俾斯麥是其中佼佼者。這兩個人人都絕頂聰明，對國際局勢瞭解透徹，對自己的政策毫不讓步，對待同僚甚至上司都相當霸氣，更不用說對過招的外國對手，但他們對國家利益維護確實沒有話說。

帕瑪斯頓認定法俄兩國與英國有難解的利益糾紛，是英國的對手，所以其反法、反俄的立場旗幟鮮明，手法狠辣。但帕瑪斯頓也是最務實

的人，如果與這兩個國家合作，反可以維護英國利益，他也絕不受原有立場的牽絆。他的名言：「英國沒有永久的朋友或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傳唱千古，是辦外交的至理名言。

俾斯麥是另一個頭腦冷靜的範例。他和梅特涅一樣，功於外交精算，每一出招都是謀定而動，所以把奧國法國都擺佈得動彈不得，但他並未因此而得意忘形。他一生最大的失算是強迫法國割地，這成為他日後需要用盡心機，預防報復的負擔。另外一個失著則是太過重視奧匈，這使得德俄關係受到嚴重的損壞。雖然如此，他至少知道自己所犯的錯，致力彌補。德意志統一後，他所建構的複雜同盟體系就是既在防法，也在防俄。他以為國家初統，德意志在內政上，應努力於國家建構（nation-building）工程，在外交上，應爭取國際社會的接納，維持和平的國際環境，保障德國的安全。因此，在統一後的頭二十年，俾斯麥領導的德意志，雖然令人敬威，還不至於令人感到會被侵略的恐懼（法國除外）。

不過多數政治外交家都是普通人，能夠免於情緒誤導，冷靜作決策的確實不容易，更何況其中許多人本來能力就有問題。俾斯麥以後的德國領導人，從威廉二世、霍恩洛厄·希靈斯菲斯特、比羅到貝特曼·霍爾維格，乃至於隱身幕後，卻對外交政策頗富影響力的霍爾斯泰因，或雖然主管海軍，但對外交決策一言九鼎的提爾皮茨，都是識見有問題，見樹不見林，或易於激動之人。德國的外交在這樣一批人的手中操作，雖有一手好牌，但由於判斷與出牌錯誤，輸得一敗塗地。

至於原就處境不佳的俄奧，照說處事更應謹慎穩重，但事實上卻更流於意氣，兩位皇帝的無能不在話下，輔佐他們的外交軍事人員就更短視毛躁。尼古拉二世在一戰前夕，對應不應該下全面動員令猶豫再三時，結果身邊人一句「這個決定確實不容易做」的無心之話刺激下，他就決定全面動員，避免被人譏為行事有欠果斷。法蘭西斯約塞夫在聽說費迪南被刺時，只會哭著說「可怕呀！全能的上帝一點都不開玩笑！」此時的奧皇已經高齡八十四，再也沒有鬥志，再也經不起打擊。這樣的帝國不崩解倒成了異數。

在外交上，政策非常重要。政策選擇一旦錯誤，後遺症非常可怕。以奧國為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決策錯誤非常之大。它捨棄一向幫助它的俄國，與英法同盟，結果又因普魯士及德意志邦聯制肘，只好解除對俄動員。這樣的作法最後遭到各方怨尤，特別是不能見諒於俄國，使它在日後與法薩及普的戰爭中孤立無援。

制定外交政策，首先一定要將國家利益理出優先順序。其次要分析本身實力，一國實力若有限，就只能選擇維護最重要的利益。再次則要分析當時的國際環境，競爭對手的強弱。如果國際環境並不利於本國，對手實力也難以企及，則須要以忍待變。如果有可能爭取他國合作，用以平衡對手力量，轉變國際不利的情勢，就應考慮爭取盟友的手段、代價。國家最重要的利益為何？其外交政策是否能達成維護其利益的目的？看法常常見仁見智。以德國為例，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時，德國最重要的國家利益為何？是繼續鞏固在歐陸的霸權？還是發展海軍，與英國去爭海上的霸權？德國應該爭取的盟友是擬議中「大陸同盟」的法俄？還是英國？德國如果要爭取法俄，應採取什麼手段才能奏效？如果要爭取英國，又應採取什麼態度？對這些問題，德國內部一再辯論，始終沒有找到正確答案，終於促成三國協約的出現。

再以英國為例，整個十九世紀，它在外交上一向採取孤立政策，但在世紀末，其政策卻不得不改弦更張，開始尋找盟友。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變革？無他，國家實力已經不如以往強大，可以獨來獨往。但是找誰做與國？遠東的日本較少恩怨，國內比較沒意見，所以很快就敲定了。但是歐洲呢？是找德國？法國？還是俄國？國內意見可就多了。英國外交部門基於專業認知，可能覺得與法國合作較好，但國內民意與在野政黨，甚至執政黨內都有不同意見，都比較鍾情德國。在這樣的民主國家內，外交部門就得運用高度技巧來推動政策。歷史證明，當年英國外相格雷確實是個中高手。

影響國際關係發展的不止是時代趨勢、政治外交家的能力智慧、政策的良窳而已，國內國際局勢，特別是經濟社會情況的演變也非常重要。十九世紀國際關係中，像是殖民帝國主義的勃興，歐洲國家彼此

間，以及它們與美國日本間的衝突，與工業化的進程很有關係。工業化對國內國際都有意想不到的影響。在國內，工業化促成大型城市出現，大量人口聚集在有限的面積內，政府對他們的管理，就不再像對散居的農村人民那麼容易。工業化更帶來社會問題、貧富差距、勞工問題、勞資糾紛。在政治上則帶來左翼政黨，如社會民主黨等實力強大的政黨出現，使政府疲於應付。在國外，則爲了原物料的供應、成品的銷售、資金的出路，帶來殖民地的爭取、勢力範圍的搶奪、市場的佔有等國際衝突。因此，說近代國際關係受經濟因素的影響很大，絕不爲過。國家爲了解決或疏導其國內的經濟、社會、政治問題，製造或挑起國際紛爭，以轉移注意，也就成了一個便宜的手段。這種情形在一次戰前如此，在二十世紀也是如此。今天國際關係中的南北問題、東西問題、北北問題、南南問題，與所謂的全球化問題，絕大部分也是經濟問題所引起。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合理解決，很難確保國際關係和平發展。

從近代國際關係史中，我們看到強權間的權力遊戲，證實了如果那個強權獨大，權力平衡不再能維持，各國安全感越來越低，那麼戰爭的陰霾就會越來越濃。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武器的毀滅性反而抑制了大規模戰爭爆發的可能性，當下美國的單一霸權也沒有那個國家能挑戰，各國也都認份的接受了這個事實。但就在此時，戰爭卻以另外一種面目出現，那就是美國口中的「恐怖主義」。巨人美國所受的震撼使它本能的傾全力反擊，但後效尙待觀察。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美國如果企圖以暴制暴，後效顯然有問題。因爲如果對手是個國家，以暴制暴可能有效，但對行蹤飄忽的「恐怖份子」，這樣的反制可能就沒有太大功效。畢竟「敵暗我明」，光腳的不怕穿鞋的，而且這些「高僧」連「廟」都沒有，如何剿滅？爲美國計，全面政策檢討，特別是對以阿政策之檢討，不失爲斧底抽薪之計。

政治家與外交工作者的職責在維護國家利益，但不應是小利、短利，不應是將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對它國的損害上，這樣的關係注定不可能長久，一旦弱者轉強，情勢就會反轉，強者就會遭到報復。換言之，在國際關係中，只有所有的國家都能共存共利，都有得有失，都相互妥

協，才能期待國際和平可以長久維持。從這個角度看，帕瑪斯頓是英國人眼中的偉大政治外交家，但卻是法俄兩國眼中討人厭的對手，更是我們中國人眼中驕寵跋扈，欺壓善良的帝國主義者。從這個角度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外交政策在美國人眼中是成功的：蘇聯瓦解了，東歐解放了，美國在伊拉克、前南聯、阿富汗的用兵都勝利了，美國已經是世界唯一霸權。但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甚至其他地區的阿拉伯人眼中，美國卻是盲目支持猶太人的邪魔，在歐洲盟國眼中也是個霸氣十足的盟友，在分裂國家人民眼中，更是個見不得人家和好，善玩分而治之遊戲的高手。而美國雖然是一超獨霸，巨人也有他致命的弱點，這就是911事件發生的原因。

再也不希望見到我們的政治外交家，像滿清時代那麼無能與喪權辱國，沒有對策。但在國際間尋找中國安身立命應有的地位之前，我們希望兩岸的政治領導人先能解決眼前棘手的經濟、社會、兩岸關係、政治改革等問題。只有停止內耗，才能發展。但當中國人站起來時，希望能記取歷史的苦難，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如果國家的領導人沒有民胞物與、人飢己飢的胸懷，沒有世界大同的嚮往，一味以確保本身權位為念，以人民為芻狗，以鄰為壑，造成國內政局動盪，國際關係正義不彰，就很難維持和平，而和平，是二十一世紀最高的道德，是我們每個人都應努力以赴協助完成的目標。這是讀史者與有志於外交工作者所應共勉的。

目錄

序 01

第一篇 歐洲協調及民族覺醒 01

第一章 維也納會議與歐洲協調制度 07

第一節 會議召開的背景

- 一、會議核心人物素描
- 二、列強的共同目標
- 三、列強間的內部矛盾

第二節 妥協的達成

- 一、會議指導原則
- 二、核心爭議
- 三、外交交鋒，各顯神通
- 四、會議的結果與評價

第三節 協調制度之成立

- 一、第二次巴黎條約
- 二、神聖同盟
- 三、四國同盟

第四節 協調制度之運用

- 一、愛克斯拉夏巴勒會議
- 二、特羅寶及萊巴赫會議
- 三、維戎納會議

第五節 協調制度之考驗

- 一、西屬美洲的獨立問題
- 二、希臘獨立問題

註釋

第二章 革命騷動與列強關係變化 71

第一節 1830年的革命

- 一、法國革命
- 二、比利時的獨立
- 三、革命的擴散

第二節 地中海情勢與列強新關係

- 一、三十年代初的地中海情勢
- 二、英法諒解的式微

第三節 英法破裂與歐洲情勢

- 一、英法摩擦之加深
- 二、英法破裂後的歐洲情勢

第四節 1848年的革命蔓延

- 一、革命的背景
- 二、法國的二月革命
- 三、革命的蔓延
- 四、決定革命成敗的關鍵人物

第五節 革命的潰敗

- 一、義大利及匈牙利問題之處理
- 二、德意志統一努力之失敗
- 三、革命失敗後的國際新形勢

第六節 克里米亞戰爭

- 一、尼古拉一世的近東政策與英法態度
- 二、教士之爭與戰爭爆發
- 三、戰爭進行及外交活動
- 四、巴黎會議

註釋

第三章 民族統一運動之成功 165

第一節 義大利的統一

- 一、義大利民族主義的發展
- 二、法國的立場
- 三、統一的過程
- 四、義局發展的檢討

第二節 路易拿破崙的外交政策及其檢討

- 一、法國的巴爾幹及近東政策
- 二、插足亞洲與美洲事務
- 三、歐洲民族主義的考驗

第三節 德意志的統一

- 一、俾斯麥與普魯士
- 二、普奧衝突
- 三、普法衝突

註釋

第二篇 權力政治與合縱連橫 255

第一章 俾斯麥體系之建立與調整 265

第一節 法國復原與三皇同盟

- 一、普法戰後的法德關係
- 二、三皇同盟
- 三、法德關係之考驗

第二節 近東問題與柏林會議

- 一、近東問題與列強態度
- 二、戰爭經過與戰時外交
- 三、聖史蒂法諾條約

四、柏林會議及其檢討

第三節 俾斯麥同盟體系的誕生

一、德奧同盟

二、三皇同盟的再生

三、突尼西亞問題與三國同盟

四、埃及事件與英法交惡

第四節 俾斯麥同盟體系的調整

一、影響同盟之國際情勢

二、三國同盟之續約

三、地中海地區的新安排

四、德俄再保證條約

註釋

第二章 殖民衝突與權力重組 343

第一節 德俄交惡與法俄同盟

一、俾斯麥下台與德國對俄政策之轉變

二、法俄同盟之誕生

第二節 國際舞台延伸與列強政策改變

一、法國的外交重心

二、俄國外交重心之轉移及與日本之利益衝突

三、德國外交之改弦易轍

四、英國的殖民煩惱與政策選擇

五、奧匈與義大利的政策局限

第三節 世紀末的殖民衝突熱點

一、英法法碩達之爭

二、波耳人戰爭與英德摩擦

三、甲午戰爭與三國干涉還遼

四、劃分中國勢力範圍

五、美國崛起與美西戰爭